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丘逢甲於乙未內渡前在台灣本土詩人圈子中屬於佼佼者¹，內渡後也是晚清中國大陸詩界極為知名的台灣籍詩人之一。晚清時代的台灣雖然也產生不少優秀的台灣本土籍詩人，但在以中國大陸來台的宦遊人士為主的文學集會中，丘逢甲仍能以本土詩人的身分參與其中且表現不俗，連橫說：

邱逢甲，字仙根，又字仲闕，彰化翁仔社人，後隸臺灣。社處大甲溪之旁，土番部落也，粵籍居之，故其俗尚武負氣；而逢甲獨勤苦讀書，年十三入泮。時吳子光設教呂氏之筱雲山莊，藏書富。逢甲負笈從，博覽群籍，遂以詩文鳴里中。灌陽唐景崧以翰林分巡臺灣道，方獎掖風雅，歲試文生，拔其尤者讀書海東書院，厚給膏火，延進士施士浩主講。於是逢甲與新竹鄭鵬雲，安平汪春源、葉鄭蘭肄業其中。未幾，聯捷成進士，授兵部主事，為崇文書院山長。及景崧陞布政使，邀其至，時以文酒相酬酢。臺灣詩學為之一興。²

唐維卿觀察既耽風雅，獎藉藝林，一時宦游之士，若閩縣王貢南毓青、侯官郭寶實名昌、丹徒陳翥伯鳳藻、德化羅穀臣大佑、順德梁挺生維嵩及吾鄉施灃舫士洁、邱仙根逢甲等皆能詩。時開吟會，積稿頗多。唐韡之太守

¹ 連橫《台灣詩乘》卷5：「光緒以來，臺灣詩界群推施灃舫、邱仙根二公，各成家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64種，1960，頁215。

² 連橫《臺灣通史》卷36列傳8 邱逢甲列傳，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28種，1962，頁1033。

輯而刊之，名曰《澄懷園唱和集》，版藏臺南松雲軒。³

說明了乙未割台前的光緒年間，台灣傳統詩壇在唐景崧等來台宦遊人士的獎勵鼓舞下，台灣本土文人獲得來台宦遊人士的肯定，而丘逢甲便是台灣本土文人中，與來台宦遊人士酬唱交流，並取得豐碩成果的重要人物之一。

丘逢甲於乙未內渡後，其在晚清中國大陸詩壇的文學成就，也被台灣詩評家視為台灣傳統詩人的驕傲與模範，王松《台陽詩話》說：

邱仙根工部(逢甲)，才情學力，冠絕儕流。乙未回粵，大府延掌潮洲韓山書院，成就甚眾，一時仰之如泰山、北斗。工部詩才，淋漓悲壯，盤錯輪困，肖其為人。海澄邱菽園孝廉嘗舉與嘉應王曉滄(恩翔)、番禺潘蘭史(飛聲)、安溪林肇雲(鶴年)並稱四子，識者歎為知言。茲有 題潘蘭史說劍堂集 七古長篇云：「劍龍出海辭延津， 諸天雲立群龍聽」。錄之以誌傾倒。集名《蟄庵存稿》，皆乙未以後所作；正如子美入秦、劍南入蜀，感喟蒼涼，當不在古人以下也。

《金城唱和集》一卷，乃邱仲闕工部(逢甲)與王曉滄廣文(恩翔)二人所著，菽園先生為之刊行。 古體如 和鳳凰臺放歌、 題風月琴樽圖 等作，工力悉敵，不慊古大家；惜卷帙有限，不能備載。⁴

內渡後的丘逢甲雖然在台灣留下諸多爭議⁵，但其文學方面的功力與成就，並沒

³ 連橫《臺灣詩乘》卷5，同註1，頁210。

⁴ 王松《台陽詩話》下卷，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34種，1959，頁51-52，56。

⁵ 例如有沒有與日軍交戰、何時內渡、是否挾軍餉內渡 等關係到丘逢甲操守的爭議，至今仍未有定論，為丘逢甲關謠的有中國大陸學者吳宏聰、李鴻生主編《丘逢甲研究 - 1984年至1996年兩岸三地學者論文專集》(台北，世界丘氏文獻社，1998)、徐博東和黃志平合撰《丘逢甲傳》(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9) 等，而傾向於持保留態度的有台灣學者黃秀政、楊

有因此而受到質疑與被淡忘。他身處在中國大陸的文人圈子中，仍不斷透過與維新派人士酬唱的方式，和發表詩作於《清議報》的行動（詳見第三章第一、二節），以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學聲望，並且確實獲得梁啟超提倡「詩界革命」⁶的肯定，這看在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人的眼中，應是一件成功的文學盛事，可見，丘逢甲的文學成就不管是內渡前還是內渡後，都是近代台灣文人心目中的佼佼者，代表著臺灣本土文人文學發展的典範。

其次，就晚清中國大陸詩壇來看內渡後丘逢甲的文學發展，丘逢甲內渡後曾作 論詩次鐵廬韻 七絕 10 首云：

元音從古本天生，何事時流務競爭？詩世界中幾雄國？惜無人起與連衡。

邇來詩界唱革命，誰果獨尊吾未逢。流盡元黃筆頭血，茫茫詞海戰群龍。

新築詩中大舞臺，侏儒幾輩劇堪哀。即今開幕推神手，要選人天絕代才。

臺上風雲發浩歌，不須猛士再搜羅。拔山妄費重瞳力，夜半虞兮唱奈何。

北派南宗各自誇，可能流響脫淫哇。詩中果有真王在，四海何妨共一家。

彼此紛紛說界疆，誰知世有大文章。中天北斗都無定，浮海觀星上大郎。

護源 丘逢甲與一八九五年反割台運動（黃秀政等《臺灣史志論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3，初版二刷，頁 153-185）。

⁶ 「詩界革命」雖名為「革命」，但實質上是「改革」，因為其終究是以傳統詩的形式來寫作。革命是針對傳統詩寫作觀念的侷限性而言，再配合上晚清知識分子號召變法維新的時代氛圍，稱為革命更具有行動意義，所以梁啟超以「詩界革命」定名之，但黃遵憲不稱之為「詩界革命」，而稱之為「詩界別創」，比較符合實質意義。由於文學史多直接以「詩界革命」稱之，故本論文行文時也統一用「詩界革命」來稱之。

芭蕉雪裏供摹寫，絕妙能詩王右丞。米雨歐風作吟料，豈同隆古事無徵。

四海橫流未定居，千村萬落廢犁鋤。荊州失後吟梁父，空憶南陽舊草廬。

展卷重吟民主篇，海山東望獨悽然。英雄成敗憑人論，贏得詩中自紀年(來詩有民主謠)。

四海都知有蟄庵，重開詩史作雄談。大禽大獸今何世？目極全球戰正酣。

⁷ (頁 520-521)

可強烈感受到，丘逢甲有自信憑著自己的詩藝和對時局的見解，在當時盛行的「詩界革命」文學版圖中，脫穎而出並佔有一席之地。而詩界革命的主要倡導者梁啟超評價丘逢甲說到：

吾嘗推公度(黃遵憲) 穗卿(夏曾佑) 觀雲(蔣智由)為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闊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 己亥秋感八首 之一云：「遺偈爭談黃蘗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鰲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訛厄運年。心痛上陽真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讖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⁸

⁷ 丘逢甲著，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丘逢甲集》，湖南，岳麓書社，2001年12月，1版，頁520-521。由於該書蒐集了目前海峽兩岸所見丘逢甲最完整的文學作品，故本論文所引任何丘詩，皆以此為本。同時，為了兼顧註明出處與版面簡潔的考量，若是引自《丘逢甲集》的詩和文，統一於引詩或引文後註明頁碼，不再一一詳加註腳。

⁸ 梁啟超此語原刊登於光緒28年(1902)9月15日《新民叢報》第18號「文苑」欄的 飲冰室詩話，後收錄於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39則，參見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第9冊第18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5313。

可見丘逢甲在詩界革命「新派詩」⁹的創作上，以民間的俗話用語和題材，成功融入古典詩傳統的風格中，而獲得梁啟超的高度肯定，成功取得自己在詩界革命中的一席之地。時至今日臺灣文史界對丘逢甲內渡一事，儘管有著兩極化的看法，但若持平來論丘逢甲的成就，施懿琳 從歷史人物再評價的觀點論晚清台灣詩人丘逢甲 認為：

人中龍鳳的丘逢甲在面對挑戰與困頓時，或許曾表現了他脆弱的一面；然而，就他一生對近代中國教育及文學上的貢獻而言，棄師西渡畢竟只是大醇中的小疵。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不夠徹底的抗日英雄，但是，我們卻該肯定他在興學設教以及詩界革命上的積極成就，也應該相信他愛國憂國應純然出自一片真誠。¹⁰

意思是丘逢甲在抗日行動的過程中確實有瑕疵，但在推動新式教育和參與詩界革命的成就上，又真的是值得肯定，做學術研究應該公平客觀，是非分明，不需隱惡揚善，但也不要因人廢事，如此才能將丘逢甲的相關研究做的透澈。

⁹ 符合「詩界革命」理論的詩作通稱「新派詩」，因為詩界革命的典範黃遵憲自稱自己的詩為「新派詩」。魏仲佑《黃遵憲與清末「詩界革命」》說，黃遵憲的新派詩本質上是「我之詩」，亦即表達個人心胸的詩，詩境要復古人比興之體，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採取民歌自由活潑的精神，以及古文文章的組織與條理，取材上，凡合於今用的一切文獻均予包容，述事上，一切耳聞目見的均可以入詩，鍊格上，不專一體、不名一格，視隨時的需要而採用不同的體裁。整體而言，他要突破中國傳統詩數百年來逐漸形成的模式，因為一種藝術一旦定了型，以後的人便一代一代照著模式去寫作，這樣的藝術便失去精神，亦即失去了藝術本身的生命力。故「新派詩」是指凡是突破傳統的詩均可稱之，不侷限於用外來語、現代語或描寫新經驗等的詩。（台北，國立編譯館，1994.12，頁 178-180。）

¹⁰ 施懿琳 從歷史人物再評價的觀點論晚清台灣詩人丘逢甲，《從沈光文到賴和 - 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頁 181。

所以，就臺灣文學而言，丘逢甲內渡之後的文學可以界定為「懷鄉文學」、「移民文學」¹¹或「後遺民寫作」¹²；但就晚清甚至是近代文學而言，丘逢甲的文學成就應該主要表現在，其以台灣籍詩人的身分於中國詩界革命新派詩的成功實踐上。而到底丘逢甲在詩界革命中有什麼具體的表現？在「懷鄉文學」、「遺民文學」、「後遺民文學」之外，還獲得什麼樣的評價？因此，研究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關係，及其與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界的關係，不管在晚清中國詩壇還是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壇來看，都有其特殊意義與必要性，尤其對於日治時期的台灣傳統詩壇而言，儘管面臨了新文學家的凌厲批判與新時代環境的變遷，多數舊文人依然對舊文學的典律有所堅持，這是周旋於現代／傳統、新學／舊學、西洋文化／東洋文化、和文／漢文等複雜糾葛的文化情境與國族認同下的價值認定與思考，也因此與新文學家間形成了緊張的對立關係¹³。日治時期傳統詩人面對多重層面的焦慮與衝突時，丘逢甲內渡後在中國大陸「詩界革命」所獲得的文學成就，是否提供了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人，在面對新文學的質疑與挑戰之時，以及面對自身傳統的改革與延續的重要時刻，一些關於傳統詩因應時代的思考？正是本文研究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最主要的動機。

¹¹ 丘逢甲在詩中自稱為「遺民」，抒發乙未割台之痛。此外乙未世代的一世文人，也多自稱為「遺民」，例如王松、洪棄生等。

¹²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說，後遺民與傳統遺民最大的不同在於後遺民是一種精神原鄉的棄守，站在歷史的廢墟前，現代主體不能不感受到無邊的荒涼，卻必須以回顧過去的不可逆返性，來成就一己獨立蒼茫的位置。而丘逢甲的後遺民寫作的意義在於突顯台灣主體意識的曖昧性，已然將故鄉等同於故國，這個故國未必是清廷或台灣民主國，而可能是南明遺民或廣義的漢族遺民的代稱。該文並未收錄在《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9，初版1刷）一書中，而是見《中研院近現代文學研究室》網頁，網址是
http://fgu.edu.tw/~wclrc/drafts/America/wang-de-wei/wang-de-wei_03.htm

¹³ 黃美娥《醒來吧！我們的文壇——再議 1941 年至 1942 年台灣新舊文學論戰》，東海大學中文系「日治時期的台灣傳統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4.13，頁 182。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丘逢甲生平簡介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乳名秉淵,早年又字吉甫,號蟄仙、蟄庵、仲闕,別署倉海君、南武山人、海東遺民、華嚴子、痛哭生、工部、自強不息齋主人等。清同治3年(1864甲子)生於臺灣府淡水廳銅鑼灣雙峰山(今苗栗縣銅鑼鄉),民國元年(1912)因病卒於廣東省鎮平縣祖籍老家,得年49歲。丘逢甲的一生際遇,不管是思想還是文學,大致以光緒21年(1895乙未年)離台內渡大陸為分野,可以分成內渡前、內渡後兩期。¹⁴

(一) 內渡前(1~32歲): 同治3年 ~ 光緒21年(1864-1895)

丘逢甲自幼承庭訓,隨父親丘龍章到處坐館設教,10歲(同治12年、1873)時,父親設教於彰化縣三角莊(今台中縣神岡鄉),丘逢甲隨往就讀,結識台中神岡筱雲山莊呂汝玉、汝修、汝誠三兄弟,呂家是三角莊的望族,藏書豐富,並延請名舉人吳子光為教席,丘逢甲以師禮事吳子光,並得以閱覽呂家藏書,增廣見聞。14歲(光緒3年、1877)中童子試,福建巡撫丁日昌為主考官,丘逢甲在席間完成窮經致用賦、試場即景、全臺利弊論,丁日昌呼之奇童,贈「東寧才子」印。

¹⁴ 丘逢甲生平簡介主要參考賴曉萍《丘逢甲潮州詩研究》第一章第二節 丘逢甲的生平 (碩士論文,台中,逢甲大學中文所,2002.9,頁5-8),部分加入筆者的補充與修飾。

光緒 10 年(1884、甲申)，中法戰爭爆發，法軍進犯臺灣及福建沿海，丘逢甲因此感受到家國之憂，自此更留心中外事故及西方文化，慨然有維新之志。光緒 13 年(1887)，臺灣建省，劉銘傳為首任巡撫，唐景崧任台灣兵備道，招丘逢甲入幕府佐治，丘逢甲並拜唐景崧為師，攻舉子業。唐景崧藏書頗豐，因此丘逢甲得以盡攬古今中外朝聞國政及百家小說。光緒 14 年(1888)，丘逢甲 25 歲，中舉人，次年(光緒 15 年、1889)26 歲，進士及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不久後，以朝廷百政紊亂，乃援例以老告歸，返回台灣。

丘逢甲回到台灣後，唐景崧延聘其為台南府崇文書院講席，而後又兼臺灣府衡文書院及嘉義縣羅山書院講席，丘逢甲除了講授應試文藝之外，還兼受中外史實與世局新知，並勸勉學生多閱報章以廣見聞。光緒 18 年(1892)，臺灣通志總局正式開設，在唐景崧等人的主持下，《臺灣通志》的編纂工作開始進行，此時丘逢甲除講學書院之外，還兼任臺灣通志採訪師，負責採訪鄉土故實。光緒 20 年(1894 年、甲午)，中、日因朝鮮東學黨之亂，共同出兵朝鮮，亂平之後，日本不願撤兵，於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海軍連連失利，朝廷下旨飭令台灣加強海防，此時唐景崧任台灣布政使，協助台灣巡撫邵友濂辦理防務，丘逢甲奉旨招募義勇，督辦團練，後改稱義軍，為日後對日抗戰的主要兵力。同年，邵友濂離職，唐景崧升任台灣巡撫。

光緒 21 年(1895 年、乙未)3 月，中、日約定停戰，但是僅限於東北地區，臺灣不在停戰約定範圍內，於是日軍全力攻臺，台灣人民對此同感憤慨，此時，丘逢甲一面佈署義軍，並 10 次上書台灣巡撫唐景崧，陳言義軍護衛台灣的決心，希望可以力戰到底，然而清廷卻在同年的 3 月底，由李鴻章為代表簽訂馬關條約，協議割讓臺、澎於日本；馬關條約既定，台灣人民深感悲痛，向清廷、列強各國奔走聲請救臺，並上書誓言力抗日軍，不願臣服，但是清廷的回應卻是「台灣雖重，比之京師則台灣為輕」，執意割讓臺灣，於是台灣士紳倡議自立為「台

灣民主國」；5月2日「台灣民主國」成立，唐景崧就任總統，丘逢甲任義軍統領，自此展開更為艱辛的護臺歷程。日軍進攻的速度極快，5月6日自澳底(今台北縣貢寮鄉)登陸，唐景崧駐軍台北，日軍登陸後，台北軍情告急，唐景崧遂於5月15日離臺內渡，日軍輕易攻破台北城，一路南下，駐守中部的丘逢甲原決定奮戰到底，在部將謝道隆以「臺雖亡，能強祖國則可復土雪恥，不如內渡也。」為由勸導下，也決定離臺內渡，時間應該不會晚於6月下旬，時年32歲。

根據廣東丘逢甲研究會所編《丘逢甲集》來看，丘逢甲內渡前的詩作約有400餘首，其中《柏莊詩草》佔了267首，內容題材為對時局的憂心，對平民士著的關懷，對文學或文化活動的紀錄，對台灣奇山異水或特殊風候的描摹等，詩作風格具有雄豪矯健的特色，不知不覺之中，為內渡後參與詩界革命打下一定的基礎。

(二) 內渡後(32~49歲): 光緒21年 ~ 民國元年(1895-1912)

丘逢甲於光緒21年(1895年乙未)內渡之後，原本定居於祖籍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但是鄉里的人傳說丘逢甲攜帶鉅款內渡，聯名指控「丘逢甲守臺抗日為違旨作亂，應予嚴拿懲辦」，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進士造反案」¹⁵。為此，丘逢甲前往廣州，尋求當地士紳名流提出上訴，得到廣東巡撫許振燁、刑部侍郎廖壽恆的信任，聯名上奏丘逢甲抗日護臺的經過，並請求朝廷褒揚錄用。不久，朝廷頒下了諭旨，命丘逢甲「歸籍海陽」(即潮州)，這個結果顯示朝廷對丘逢甲在臺

¹⁵ 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9，頁115、123)說，1895年丘逢甲內渡之初，義軍叛將呂廣虞捏造丘逢甲「卷餉潛逃」之說，傳到了廣東鎮平，當地一些土豪劣紳借機脅詐，聯名誣告丘逢甲守台抗日是「違旨作亂」，應予「嚴拿懲辦」，一時間，「進士造反」之說流傳鄉里。後來廣東巡撫許振燁將這份訴狀判為「挾私誣害」，並協同刑部侍郎廖壽恆聯名上奏朝廷，請求褒獎錄用丘逢甲，但朝廷批覆的諭旨是「歸籍海陽」。

抗日的行動是不予置評的，不判刑罰，也不予錄用，只遣其歸籍海陽，使丘逢甲的情緒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但至少可以離開嘉應州的流言紛擾。

光緒 22 年(1896)冬天，丘逢甲領著妻小自鎮平縣的山村，來到濱海的潮州府，在此定居，一住就是 3 年多的光景。在此期間，丘逢甲與黃遵憲自戊戌政變後便開始密切互動，因而與康有為、唐才常、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也有往來，便得以進入詩界革命的文學發表園地，例如《清議報》的「詩文辭隨錄」和《新民叢報》的「飲冰室詩話」。此外，丘逢甲先後於潮州府韓山書院、潮陽縣東山書院、澄海縣景韓書院講學，擬以新學教授潮州子弟，然而此舉受到地方守舊人士反對，因而促使他有自立興辦新式學堂的念頭，在光緒 25 年(1899)冬天，丘逢甲辭去書院的教職，準備籌辦「嶺東同文學堂」。

光緒 26 年(1900 年庚子)，丘逢甲被粵東當局派往南洋調查僑情，並乘便籌募「嶺東同文學堂」的開辦經費，南洋之行，在新加坡與摯友丘菽園相見，此行他增廣了許多海外的見聞，更有助於寫作符合詩界革命新題材、新意境要求的新派詩作；丘逢甲在南洋遊歷約 4 個月，期間在潮州的家人因鼠疫為患，舉家遷回鎮平縣，丘逢甲回國後，便離開潮州與家人定居鎮平，只有為了辦學之事，才往來於潮州、汕頭、廣州之間。

光緒 27 年(1901 年辛丑)春天，「嶺東同文學堂」在汕頭正式開辦，以新學教育青年，並鼓勵學生赴海外留學，吸取更完備的西方思想，丘逢甲的教育方式為革命運動造就許多人才；然而此時風氣未開，丘逢甲創辦新式學堂，仍然受到多重阻礙，光緒 29 年(1903)冬天，他辭去「嶺東同文學堂」的教職，欲赴廣州謀求新式教育的發展，卻沒有結果，於是回到鎮平，此後兩年，陸續開辦「鎮平初級師範傳習所」與「員山」、「城東」兩所家族學堂；光緒 32 年(1906)，丘逢甲先後被聘任兩廣學務公所參議、廣州府中學堂監督等職，光緒 34 年(1908)，又被推舉為廣東教育總會會長；自離開潮州之後，丘逢甲一直奔走於鎮平、潮州、

汕頭、廣州之間，為教育事業努力，終於有了不錯的成果。光緒末年的廣東，已是革命黨人極為活躍的情況，丘逢甲與他們的交往極為頻繁，丘逢甲雖未參與革命之事，但基於師生情誼，暗中保護革命黨人，宣統 2 年(1910)，革命聲浪風起雲湧，丘逢甲曾言「是吾志也。吾欲行民主於臺灣，不幸而不成，今倘能成於內地，余能及身見之，九死所無恨也。」這個心願在他有生之年，總算達成，民國元年(1912)，國父於南京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同年 2 月，宣統皇帝宣布退位，結束滿清皇朝，此時丘逢甲已經因病回到鎮平，2 月 25 日，病逝於鎮平家中，得年 49 歲。

丘逢甲內渡後的詩作約有 1858 首，輯為《嶺雲海日樓詩鈔》12 卷，內容多抒發對時局的感懷與憂心，思念故鄉台灣的人事物，離台內渡後生活境況的不如意等，詩作風格轉為悲涼滄桑，常有以超現實的表現手法來寫作遊仙詩。

二、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壇的文學環境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為了有效控制台灣文人的思想，使出攏絡的手段，藉由頒發紳章，舉辦「饗老典」與「揚文會」，推行詩人聯吟與結社活動等，在雙方和平友好的互動中，使台灣文人心理意識上疏於防備，默默消滅台灣文人的漢族意識和抵抗意志，並進行思想轉化的目的。因此，就統治者的政策面和文學發展歷史的真相而言，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檯面上的主流，應該是傳統詩的寫作，除了 1924 年後新文學發展成熟，直至推行皇民化運動，漢文被禁前夕的這段期間，台灣傳統詩被新文學暫時性地取代了主流發聲地位，其他三十餘年的日治期間，傳統詩才是檯面上的主流文學。

然而，面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策略，台灣詩人也表現了不同的因應方式。其中確實有部分知名的詩人在殖民政策的拉攏之下，以及為了維護自己原先的社

會階級與利益，以致於思想逐漸被殖民政府收編，而採取了歌頌式的政治認同書寫，例如吳德功，尤其歸順殖民政府後的他，反而更能方便地「推展社會慈善、福利工作」與「延續漢文，推展社會教育」等理念，當然對於台灣傳統詩人有著很好的示範效果¹⁶，所以日治時期的傳統詩在殖民文化政策的運作下，確實產生不少歌功頌德式的作品，後來還發展出類似文字遊戲的擊鉢吟。雖然這些「御用文學」與「遊戲之作」，在文學的意義上價值不高，但卻是伴隨著台灣特定時空條件而發展成熟的歷史真相，沒有這個部分的作品與風氣，就不會產生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內部的反省改革，也很難發生 1940 年代激烈的新舊文學論戰，所以今稱日治時期的「御用文學」與「遊戲之作」是以負面觀感來看待，但事實上他們既反映當時台灣真正的文學環境與風氣所在，也剛好提供台灣傳統詩界進行改革，進而與新文學發生對話的最佳背景，因此「御用文學」與「遊戲之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不足以全面而中肯地詮釋日治時期的台灣傳統文學。

其次，由於乙未後台灣正式由日本帝國殖民，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經成為一個高度西化的國家，台灣也間接由日本殖民帶進來的西化風貌，強烈感受到現代性文明的衝擊，傳統詩人雖然對現代文明的接受程度不一，但反映在寫作上無可避免地出現以描寫西方文明事物為題材的「新題詩」，同時若干詩社的成員也創辦報紙或善用平面媒體，藉由討論或筆戰而形成輿論或共識，提倡某些文學思想與理念，例如瀛社《臺灣日日新報》、櫟社《台中新聞》、台灣文社《臺灣文藝叢誌》、南社《台南新報》和《三六九小報》、星社《臺灣詩報》等，黃美娥說到：

這些社群團體以印刷媒體表達捍衛漢文的決心與各式理念，刊載各地詩會活動或全島聯吟大會訊息，以串聯更多擁護漢學的力量，甚至在吟會活動

¹⁶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 - 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第五篇第一章，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6，初版，頁 363-404。

中發表言論，參與社會改造，或企圖完成某些社會問題的改善。¹⁷

足見日治時期的詩社活動與其宣傳方式，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文藝性質的，但其中也隱含著社會改革的目的，或許可以這樣說，詩社與其附屬的報刊所提倡的文學改革理念，在某種程度上也屬於社會或政治改革的理念。

總之，日治時期的台灣形成特殊的文學環境，令內渡後積極參與詩界革命的丘逢甲，有機會重新與台灣的傳統詩界發生關係，成為台灣人想要學習標榜的對象，突顯他在臺灣傳統詩壇的重要影響力。這些特殊的文學環境為：（一）首先是以歌功頌德為檯面上具有主流地位的「御用」傳統文學，以及後來演變出來的擊鉢吟遊戲之作，讓傳統詩有內部自行先發難的機會。（二）再者是台灣傳統詩人面對日本殖民政權所引進的現代文明，在寫作題材和心態上的全新體驗，也提供傳統詩有求新求變、擺脫既訂作法的溫床。（三）最後由於日治時期傳統詩社林立，詩人形成地區性的集團組織，本來就適合發展特定文學流派，加以多數大型詩社皆懂得善用報刊媒體來作為宣傳的手段，只要有某位重量級的詩人在報刊媒體上提倡某種文學主張，很快就會產生迴響，因而達成全島詩人的共識或演變成激烈的筆戰。以上文學背景，即是丘逢甲內渡後參與詩界革命，能夠在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壇方面，發生關係與聯結的客觀條件。

三、詩界革命發展經過與主要特徵

（一）發生前夕的文學背景

¹⁷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 - 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第三章 實踐與轉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12，頁 153。

晚清的詩壇眾聲喧嘩，百花齊放，除了詩界革命新派詩外，還有宗宋的同光詩、宗漢魏的王闓運湘鄉詩派、宗中晚唐的張之洞詩派，每個詩派都有其基本盤，最後文學史上仍以「同光詩派」為晚清詩的主流，而詩界革命則往往被放到白話文學的開頭來談，將它定位為新舊文學轉換與過渡性質的文學階段，其位於晚清傳統詩界的意義顯得不那樣重要。¹⁸

狹義的詩界革命「新學詩」時期，發生於甲午戰爭前後¹⁹，時值同光詩興盛的時期，而結束於滿清滅亡前夕。晚清詩壇一直以同光詩為主流，詩界革命最後也不敵同光詩而消溶於白話文運動之中，但就歷史發展而言，詩界革命的發生是針對同光詩不合時宜而來的。魏仲佑分析中國寫詩傳統與同光詩的同異之處，且令詩界革命得以著力切入的地方：

- 一、明代詩人多以修辭經營為作詩的主要目的，此種寫作習慣沿襲至清代，成為中國詩壇牢不可破的傳統。清道光以後西方傳入的新事物和新觀念，雖成為詩家吟詠的新題材，但對傳統詩的韻味殺傷力極大，

¹⁸ 張永芳《晚清詩界革命論》（廣西，漓江出版社，1991.5，頁177）說，在詩界革命消歇之後，這種通俗化的勢頭並未冷卻，繼續發揮著影響。直接模擬民間說唱形式的新粵謳，在辛亥革命時期猶傳唱不已；斟酌多種民間文藝形式創作出來的通俗體歌詞「新體詩」（歌體詩），更是直接被革命派接受過去，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通俗化的趨勢本身，並不是詩界革命倡導者追求的目標，以通俗化為手段，追求更好的思想宣傳效果，才是他們的目的。

¹⁹ 郭延禮《詩界革命的起點、發展及其評價》（《文史哲》，2000年第2期，頁5-12）將發生時間訂為1895年譚嗣同等人「新學詩」時期，此說法最早見於朱自清《中國詩的出路》（1933年《中國文學月刊》）一文中。另外還有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的說法，以1868年黃遵憲《雜感》「我手寫我口」為詩界革命的宣言，當然也有以1899年梁啟超《汗漫錄》正式喊出「詩界革命」口號為起點。由於黃遵憲《雜感》「我手寫我口」雖較具有原創性，但並沒有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識，所以不適合視為一個文學潮流的起點，而梁啟超明白指出其「詩界革命」是在1895年「新學詩」失敗的經驗中重新再出發，所以「詩界革命」獲得初步共識確實是在1895年「新學詩」時期，以此做為「詩界革命」文學潮流的起點是比較合適的。

晚清詩家寫作時面臨現實與傳統如何取捨的挑戰。

- 二、同光詩取法南宋江西詩派，兼以古文伸、縮、直、枉之法，可以達到表達無窮的效果，既能反映劇烈變動的社會現實，又能保有古詩溫柔敦厚的傳統，成為晚清詩壇的主流。但是同光詩人多利用考據學專業知識，注入新事物和新觀念的理解，欲在寫作新題材之時，照顧好傳統詩的韻味，卻反而令詩作陷入另一種專業，而無法喚起學人詩人群以外的讀者的共鳴。
- 三、晚清社會的遽變帶給時人空前的痛苦與絕望，部分詩人基於切身的痛苦感受，顧不得傳統詩的溫柔敦厚和修辭經營，作詩言志時公然而露骨的怒斥、譏諷和挖苦，讓詩歌直接承載人民的心聲和西方的事物觀念，而得到一個程度的效果，這便是詩界革命產生的背景。²⁰

可見，「詩界革命」是基於不滿同光詩而產生的改良式的文學主張。但是，同光體詩人與詩界革命派詩人的政治立場絕非相反，彼此的私交也不錯，例如同光詩名人陳三立、陳衍 等人曾經贊成維新變法，與詩界革命名人梁啟超、黃遵憲也有善意的互動，兩派的詩歌旨趣也有相通之處，例如反映時事、議論入詩、詩文合一、創作精神上都有求新求異的傾向 等，若說詩界革命是同光詩衍生出來的旁支也不無道理。

（二）發生歷程

詩界革命的觀念最早由夏曾佑、譚嗣同等維新人士，於康有為「公車上書」

²⁰ 魏仲佑《黃遵憲與清末「詩界革命」》第二章第四節「詩界革命」前夕與傳統詩的變調，頁77-80。

事件²¹之後的光緒 22、23 年（1896、1897）間提出，稱為「新學詩」時期。但由於太急著把國人還不是很熟的新知識、音譯的外來語、隱語等語詞，做為詩的內容與語言，更由於太急著標榜新詩、揚棄舊詩，沒多久便宣告失敗。

到了光緒 26 年（1900）正月《清議報》第 35 冊梁啟超發表《汗漫錄》一文（又稱《夏威夷遊記》，該文於光緒 25 年 12 月已寫成），正式啟動詩界革命運作的機制，它既是文學發展的一環，也是保皇維新政治活動下的產物。梁啟超在這個階段特別注重詩作「新意境」入「舊風格」的部分，強調詩人必須在修辭上謹慎地錘鍊新語句，妥善地安排新語句的位置，讓詩作既保有舊詩風韻，同時成功營造出新的意境，才能被廣泛的讀者接受，達到精神革命的效果。

梁啟超除了提出構想外，更具體提供詩界革命新派詩創作者發表的園地，例如《清議報》（1898.12.23-1901.12）的《詩文辭隨錄》、《新民叢報》（1902.2.8-1907.11.20）的《詩界潮音集》，另外《新民叢報》的「文苑」欄還刊登《飲冰室詩話》，為詩界革命提供完整的理論基礎和文學批評。根據魏仲佑《黃遵憲與清末「詩界革命」》的研究，《飲冰室詩話》雖討論了重要詩家達 116 人之多，但最具典範意義的還是黃遵憲一人，其《人境廬詩草》詩作絕大多數就是詩界革命新派詩的範作，梁啟超並且強調文學的實用性，注重「詩史」的社會意義。

²¹ 1895 年舊曆 3 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得知馬關條約簽訂的內容後，極為悲憤。他們聯合各省參加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其中台灣籍舉人有台南安平舉人汪春源、嘉義縣舉人羅秀惠、淡水縣舉人黃宗鼎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要求清廷做三件事：遷都、拒絕議和、實行變法等。假如不接受，就集體罷考。由於中國在漢朝時，政府用車馬接送被徵舉的讀書人，以示禮遇，後來就用「公車」作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所以歷史上稱康、梁這次上書事件為「公車上書」。該事件所提出的訴求，由於清廷內部守舊派的阻撓而沒有成功，但影響卻很大。公車上書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創辦「萬國公報」（後來改名為「中外紀聞」），摘登中外新聞，介紹西學、西政，繼續宣傳維新變法；還在北京組織「強學會」，集會演講、印行書刊。從此各地的維新報刊和學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到 1897 年底，全國出現了講求維新變法的政治性學會 33 個，新式學堂 17 所，報刊 19 種；到了 1898 年，學會、學堂、報館合計達 300 所以上，由此也可見維新變法風氣在全國各地蓬勃的情況。

順著此一需要，光緒 28 年（1902）黃遵憲進一步建議梁啟超提倡「雜歌謠」，即古人的「新樂府」或經文人改編過的地方山歌，梁啟超於《新小說》（1902.11-1906.1）頭幾期便開闢「雜歌謠」來提倡²²，至此完成了詩界革命的階段性任務。

（三）主要的文學特徵

詩界革命最重要的文學特徵是「新意境」，由於認識到傳統詩歌題材已不能反映劇烈變化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以及現代人的思想情感，因而主張擴大詩歌內容題材的表現領域，包括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新知識，也包括運用這些新詩料所產生的詩歌新境界。擴大題材的這份努力，真正目的在輸入西方現代文明，藉由文學感染人心的藝術手段，達到啟蒙、新民的社會功用，同時也為維新派人士凝聚政治共識，號召更多同好，以推動政治改革的終極關懷。

其次是「舊風格」，指的是中國傳統詩歌特有的格律要求，以及因此形成的特殊韻味。由於詩界革命特別重視文學的實用性，而傳統詩歌體裁的精緻優美所造成的獨特魅力，對當時大多數的創作人口而言，仍具有無可撼動的地位，所以不宜馬上拋棄，反而更應借助，於是在《新民叢報》階段，梁啟超不再強調「新名詞」的必要性，而加重「舊風格」的要求，在改革決心上看似不夠徹底，卻也具有因時制宜的意義。

詩界革命其他的文學特徵，尚有詩歌的現實感大為增強，諷諭時事與人物的尺度更為露骨，愛國主義、尚武精神的發揚，以及「詩史」傳統被提到很高的位置等等。若從開通民智、振奮民氣的目的來看，詩界革命也要求詩歌語言的通

²² 黃遵憲著，吳振清、徐勇、王家祥編校《黃遵憲集》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0，頁 494-500。

俗易懂，以及「新樂府」、「雜歌謠」與通俗文藝形式的採納，對於民國初年白話文的推動也產生極大的貢獻。

第三節 文獻評論與章節簡介

兩岸三地丘逢甲的著作及研究文獻，可參考廣州暨南大學羅志歡、魏珂《丘逢甲著述及研究資料編年》，該文收錄海峽兩岸 1892-2004 丘逢甲著述、研究專著、論文以及新聞報導等資料，約 400 筆資料目錄，其中論文和新聞報導等單篇文章，約有 300 筆資料目錄，可說是目前收錄最為完整的丘逢甲研究目錄。

另外，詩界革命屬於中國近代詩的研究領域，專著有張永芳《晚清詩界革命論》（1991）、夏曉虹《詩界十記》（1997）等書。前者將詩界革命各個階段的發展進程，例如「先導與幼稚階段」、「正式發展階段」、「高潮與消歇階段」等歷史進程，逐一引證論述；後者分成「新題詩」、「竹枝詞」、「新語句」、「新意境」等特定專題，綜合引證評論。台灣方面關於中國近代詩的研究情況，可參考羅秀美《近二十年來（1980-2000）台灣學者有關中國近代詩／學之研究述評》，有十分詳盡的分析，大抵而言台灣關於近代詩的研究，以黃遵憲研究最為突出，其次是丘逢甲的相關研究，但多數單純地以傳統詩學理論來研究「近代詩學」²³，並

²³ 羅秀美《近二十年來（1980-2000）台灣學者有關中國近代詩／學之研究述評》（《元培學報》第九期，2002.12，頁 63-81）說，「近代詩學」意指 1840-1919 年約 80 年間中國大陸所出現的詩學理論、詩人及其詩歌的相關研究，詩人群所橫跨的範圍，起自「近代文學的開山主：龔自珍」，迄於民國南社時期諸詩人。但目前關於台灣文學史的分期，多不採用「近代」為名，而

未真正意識到「近代詩學」具有自覺性地革新意識的特殊性，可見近代詩學的研究仍有待開發。

一、中國大陸部分

海峽兩岸學者歷來關於丘逢甲作家作品的研究，相較於台灣其他的古典文學家而言，丘逢甲算是曝光率很高的一位，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丘逢甲研究，更是凌駕於所有台灣古典文學家之上。據黃美娥《中國大陸有關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指出：

早在 1947 年，學界便已注意到台灣詩人丘逢甲，其後 50、60 年代曾零星出現散論之作，自 1979 年後，大陸地區彷彿興起一股研究丘逢甲其人其作的熱潮，此風一直蔓延至今仍未減退。²⁴

根據黃美娥的統計，中國大陸自 1979 年至 2000 年為止，研究清代台灣文史議題的論文共 212 篇論文，其中研究丘逢甲的論文約有 130 篇，比例超過一半。但這 130 篇論文中，所討論的大都偏重丘逢甲的生平與歷史事蹟，如抗日過程、興辦教育、支持革命等貢獻，針對丘逢甲的詩作進行討論的論文數量並不多見，即使有，也多偏重其詩歌所表現的愛國精神來討論，真正客觀探究其詩歌藝術的

是以「清季」及「日治」為分期，純因台灣有其特殊之歷史因緣所致。而「近代詩」有別於傳統詩的意義在於，中國傳統詩從元代以來便陷入「宗唐」、「宗宋」的徘徊中，始終不敢突破傳統，直到近代開始，才自覺性地產生詩歌革新、求新求變、實用、通俗化等作法，雖然形式上仍採用古典詩的體式，但內容與技巧方面，試圖衝破傳統成規，因而成為白話文運動的準備與基礎。

²⁴ 黃美娥《中國大陸有關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台灣文學學報》第一期，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00.6.30，頁 37。而中國大陸學界關於丘逢甲研究文獻的詳細目錄亦參見黃文。

作品，實在屈指可數。

近 20 年來，隨著丘逢甲的研究領域和視角的拓寬與開展，1984 年廣東省梅州市舉辦了「紀念丘逢甲誕生一百二十週年學術討論會」，1994 年「紀念丘逢甲誕生一百三十週年學術討論會」，1996 年台灣逢甲大學舉辦「丘逢甲與台灣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三次大型會議後，中國大陸方面開始集結丘逢甲研究的代表性論文，經過 10 餘年，正式出版了《丘逢甲研究 - 1984 年至 1996 年兩岸三地學者論文專集》一書，收錄了 42 餘篇論文，可說是大陸地區目前丘逢甲研究中最有份量的一本專書，但是該書雖號稱兩岸三地，但台灣學者的論文篇數只佔少數，絕大多數是大陸學者的論文，其次該書對丘逢甲的研究太過於以愛國主義和統戰意識為主軸，難以看到完整的丘逢甲全貌，對於詩歌藝術方面的討論往往不能就文學論文學，大陸丘逢甲研究視野仍有待拓展。²⁵

2004 年廣東梅州又再度舉辦了「紀念丘逢甲誕生一百四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會議中發表十餘篇論文，大多數也不脫歌功頌德的模式，且多數論文的撰寫沒有嚴謹的學術規範，令人期待落空²⁶。另外，丘逢甲的生平考述目前也有較為專門的論著，以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為代表，此書儘管敘述詳細有系統，但由於也存在著上述泛政治化的缺失，故也有美中不足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大陸學者在蒐集丘逢甲生前全數作品所投注的人力和展現的成果，確實是極為成功，以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丘逢甲集》為代表。該書不僅集結丘逢甲內渡前後的所有可見詩作，包括少年時代習作 68 首，台灣竹枝詞 40 首，參加詩社活動時的詩作 51 首，己丑年入都之作 15 首，詩鐘 215 唱，《柏莊

²⁵ 例如逢甲大學主辦的「丘逢甲與台灣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中台灣學者余美玲〈丘逢甲乙未內渡後詩歌之研究〉，是一篇就詩論詩的嚴謹學術論文，由於不特別標舉丘逢甲的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於是就沒有被收錄於《丘逢甲研究》中。

²⁶ 其中比較就文學論文學的論文，應只有台灣學者羅秀美〈丘逢甲的白話書寫—以詩界革命為觀察視域〉一文。

詩草》267首，《嶺雲海日樓詩鈔》1858首，對聯35副，像讚10篇等，總計收錄詩歌韻文類作品達2559首（篇），另有文102篇（包含丘逢甲1906年丙午日記片斷），最後附上丘逢甲相關史料文獻，以及年表和考證，可說是海峽兩岸目前可見最完整的一部丘逢甲文學全集。該書尤其將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版的《嶺雲海日樓詩鈔》卷13的選外集中諸多尚未繫年的詩作，經過確切的考證而放入《嶺雲海日樓詩鈔》裡面，適當的創作年代卷數中，呈現出較為詳實而全面的丘逢甲詩作的寫作過程，讓後來研究丘逢甲詩作的工作得以進行的更為順利。當然此書仍有缺點，即為當年丘逢甲發表於某些報刊的詩作，該書不見得有全數收集到，還有見於台灣學者廖漢臣編《臺灣省通志稿》文學篇中的澎湖賦²⁷，也未收錄，只能等待以後再進行增訂，似乎仍有遺珠之憾。

綜合以上所述，儘管丘逢甲研究在中國大陸學界相對興盛，但其研究面向仍有需要開發之處，黃美娥《中國大陸有關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說到：

長期以來，大陸地區在進行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時，常有高度強調作家、作品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現象，無可否認地，適度地稱揚挾發，有助讀者對於文人人格的崇仰，但過分追求載道功能的結果，則可能使研究者在不知不覺中忽略了作家作品藝術性的表達，甚至忽略了作家人性的其他面向，為求進行通盤而全面的研究，這種情形不能不加以注意。²⁸

此語道出了中國大陸丘逢甲研究的特色與缺失，實可供今人研究丘逢甲引以為戒。正因為中國大陸的丘逢甲研究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限制，學者們雖然也注意

²⁷ 廖漢臣編纂《臺灣省通志稿》卷6 學藝志 文學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9.6，頁280-282。

²⁸ 黃美娥《中國大陸有關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台灣文學學報》第一期，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00.6.30，頁38-39。

到丘逢甲與維新派人士的交遊往來，以及他在詩界革命中的文學表現，但都只有零星式的討論，而且對丘逢甲符合詩界革命理念的詩作，大致做一般概論性的描述，不容易看出丘逢甲在詩界革命中的特殊性，及其真正具有影響力和啟蒙意義的方面。當然，其中也有少數幾篇研究文章似乎已經看到丘逢甲在詩界革命中的特殊意義了，例如張永芳《丘逢甲與詩界革命》指出，丘逢甲在詩中使用「新名詞」只是點到為止，而非像其他詩界革命詩人那樣熱衷使用「新名詞」，其次，丘逢甲的詩作題材關注的焦點大多是廣東地方掌故，而非像黃遵憲之關注時局大事或國際事件為主，這些論點的提出固然十分珍貴，但該文只是一篇提要式的文章，沒有辦法充分論證丘逢甲在詩界革命中的特殊意義，所以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關係之研究，仍有一定的空間需要努力。

二、台灣部分

在台灣丘逢甲研究雖沒有像中國大陸般熱烈，但也累積了一定的質與量。國科會計畫有余美玲《柏莊詩草研究》（2003年），碩士論文也有徐肇誠《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研究》（1993）、楊護源《丘逢甲：清末台粵士紳的個案研究》（1995）、賴曉萍《丘逢甲潮州詩研究》（2002）等3本，大型的學術研討會由逢甲大學主辦有《丘逢甲與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丘逢甲、丘念臺父子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兩場。相關的單篇論文亦有十多篇，詳見本論文【參考文獻】所列。

台灣部分，丘逢甲的研究在文學方面比較兼顧藝術性的探討，且沒有上述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束縛，但仍偏重其詩作中具備台灣遺民文學和懷鄉文學的部分，對於不具備台灣相關意象與題材的詩作，往往又略而不談，令人無法全面得知內渡後的丘逢甲，在晚清詩壇上的文學成就，只讓人感覺到《嶺雲海日樓詩鈔》

都在寫丘逢甲懷念台灣的詩作；尤其在乙未割台的史實方面，因為丘逢甲離台內渡遺留下來的諸多爭議，至今難以真相大白，多數台灣文史學家在情感上對他又愛又恨，導致人品上的兩極化評價，而令文學藝術方面的相關研究，難以有個堅實可靠的史實為基礎，也難以深入詩人內心最底層，去一探究竟，所以台灣的丘逢甲的文學研究從某個程度來看，也被「人格即風格」的傳統文學觀困擾著，而令其相關研究產生徘徊不定、望之卻步或畫地自限的現象。

台灣的丘逢甲研究中，少數幾篇討論到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關係有：徐肇誠《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研究》（1993），該書分析丘逢甲詩作的藝術特色功力至深，論到詩界革命時，從黃遵憲具有典範地位的詩作的藝術表現手法著手，來對照丘逢甲詩作中的相同寫法，突顯丘逢甲在詩界革命文學要求之下，與黃遵憲的相同之處，徐書雖然分析地很透澈精闢，但丘逢甲與黃遵憲的不同之處，就比較看不出來。另外，余美玲《丘逢甲〈柏莊詩草〉中的四首台灣風土詩探析》，該文試著從內渡前丘逢甲的長篇古體詩作中，去找他內渡後實踐詩界革命文學理念的淵源，為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有啟發性的切入點，但如果要全面探討丘逢甲內渡前與詩界革命的淵源，顯然討論對象的取樣仍然需要增加，例如大型近體組詩《台灣竹枝詞》40首、《諸羅雜詠》10首、《遊仙詞》12首、《蟲豸詩》50首、《驢》8首等詩作，才能將內渡前與詩界革命不謀而合之處，研究的比較完整。

至今海峽兩岸學者的丘逢甲研究，儘管熱烈進行中，但對丘逢甲研究的切入點，仍會隨著研究者個別意識型態的差異，而導致兩極化的結果，也會因為研究者本身預設立場的侷限，而無法對丘逢甲整體的格局做出超然而公允的評判。若是針對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研究這一環來看，顯然丘逢甲於詩界革命中的特殊性與定位問題，其與黃遵憲寫作手法的異同比較，其對於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壇改革聲浪的影響等方面，尚有很不足的論述與研究。本論文希望跳脫意識形態與

預設立場的限制，持平地就丘逢甲做為一名傳統詩人的角度，來研究他在詩界革命中的文學表現與定位，及其內渡後與日治時期台灣詩界持續發生關係的現象。

三、章節簡介

本文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 緒論，主要論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述評，以及丘逢甲所處時代，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文學環境，包括乙未割台前後的臺灣文學環境，與晚清詩界革命的文學發展與特徵。

第二章 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淵源，本章主要在探討丘逢甲與詩界革命文學主張發生關係的主、客觀條件。首先檢索丘逢甲內渡前詩作 441 首，找出其中與詩界革命主張不謀而合之處；其次，針對丘逢甲一生不管是內渡前還是內渡後，其始終身為「在籍京官」的身分階級之意識型態，從而對尊王、保皇、大一統等觀念的認同，進而論證其內渡後會參與詩界革命的合理性；最後，客觀因素方面，由於詩界革命指標性人物黃遵憲，對丘逢甲不斷的提攜和幫助，引導他順利踏進詩界革命的文學團體，縮短丘逢甲開拓詩界革命文學版圖的時程。

第三章 丘逢甲詩界革命的積極參與及藝術實踐，本章首先探討丘逢甲與維新人士文學往來的情形，從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的詩作中，全面統計與丘逢甲以詩歌酬唱的朋友的總數，總量掌握好後，再分析朋友群中與維新運動相關的人士裡面，詩歌酬唱的內容有哪些題材，交往的深度如何，證明內渡後的丘逢甲其社交圈主要以維新運動人士或曾經支持過維新運動的人士為重心。其次，就詩界革命主要發表園地《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搜尋丘逢甲發表於這些報刊的詩作，並進行異文、數量、形式、內容題材等方面的分析，證明丘逢甲為了能在詩界革命新派詩中佔有一席之地，寫作上確實下了一番苦心，而自己的寫作專長也替詩界革命推動的初期，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除了第一、二節提

到的兩類詩作之外，最後針對《嶺雲海日樓詩鈔》中的符合詩界革命要求的詩作，但未見報刊登出的作品，做一番歸類分析，讓丘逢甲參與詩界革命的積極性與藝術實踐，能更清晰地被認識。

第四章 丘逢甲、黃遵憲二家新派詩之比較，將丘逢甲與黃遵憲的詩作一番比較，除了分析他們的相異之處外，更希望透過比較，能更精準地抓住丘逢甲詩界革命詩作的真正特色，同時也可以看到丘逢甲對詩界革命的苦心經營，分成「詩史」的比較，「諷刺詩」的比較，和「新題詩」的比較，來討論丘逢甲和黃遵憲文學表現的不同。

第五章 丘逢甲於詩界革命的定位及其與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界的關係，首先將歷來文學評論中評價丘逢甲詩作的意見，做一番綜合整理，爬梳出優點和缺點，配合著詩界革命來看，將丘逢甲在詩界革命中的定位明確地、持平地評價出來。其次，丘逢甲在內渡前已經是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詩人，而內渡後的他，特別是積極參與詩界革命的文學實踐，對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界的維新和改革，直接的或間接的方面起了什麼樣的作用？筆者希望如實地、客觀地全面論證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的文學成就，雖然在晚清詩界革命中並沒有獲致如他個人所預期的崇高地位，但若是擺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界的改良運動中來看，便會突顯丘逢甲特殊的重要性與積極意義。

第六章 結論，歸納各章論述的要點，是本文全部推論過程與研究成果的縮影。